

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

主编 万新平

天津民间宗教史

濮文起 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

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 | 主编 万新平

天津民间宗教史

主编 濮文起

山东蓝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民间宗教史 / 潘文起主编.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474-2627-2

I. ①天… II. ①潘… III. ①民间宗教 - 宗教史 - 研究 - 天津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7283号

责任编辑 赵祥斌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東畫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com.cn>

电子信箱 hbch@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30毫米

17.5印张 40幅图 22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主 编：濮文起 濮 蕾

副主编：莫振良 侯亚伟

撰 稿：时国轻 刘正平 濮 蕾

侯亚伟 濮文起 莫振良

总序

万新平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编纂《天津通史》是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期盼已久的文化盛事。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通史》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划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相继编辑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重要典型意义。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所谓“近代中国看天津”就是对天津近代重要历史地位的一种通俗的概括。比如，天津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中西社会思潮在此交汇，新式文化教育

由此兴起，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巨匠聚集津门，从而形成汇纳百川、包容中外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天津克服了发展中的种种艰难曲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宜居城市，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天津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强大引擎。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天津占有突出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发展与曲折、突破与障碍，都集中反映到天津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身上，致使天津的演变为对中国城市变迁的重要代表。通过编纂《天津通史》，对天津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深入地研究天津、认识天津、展示天津，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展示中国。

编纂《天津通史》，是一项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系统工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开拓和创新。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在理论构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实资料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必须组织一批素质优良、功力深厚、作风扎实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因此，从专题研究着手，从基础资料起步，是做好该工程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天津地区变迁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深入地总结天津城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和叙述天津的规模、形制、建筑和环境，更需要研究和分析其经济特征、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人口变化、居民素质等发展和演变的内涵；不仅要注重天津与周边地区，乃至与华北、西北、环渤海地区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关注天津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着重叙述天津本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要高度重视天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应该看到，前人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天津历史资料，但从编写大型多卷本通史的需要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历代实录、通鉴、类书、文集、方志中有关天津地区的史料，开埠以来各个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散失在国外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天津的外国租界、领事馆、教会

活动的文件、报告、调查和私人日记、信件等，近现代中外文报刊中关于天津的记述，以及反映天津历史的考古和现存文物资料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使《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建立在坚实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为此，我们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的需要，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为“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将经过专家整理的较为珍贵的中文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选编为“天津通史资料丛书”；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这三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有利于提高《天津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水平，同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时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深入地了解天津，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将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引言

濮文起

与中国西安、洛阳、成都、南京、北京、杭州等古城相比，天津建城并以“天津”^[1]称谓名世较晚，如果从明永乐二年（1404）设卫^[2]算起，至今不过600多年。

[1] 天津，金代称“直沽寨”，简称“直沽”。元代虽改称“海津镇”，但人们还是习惯称“直沽”。明永乐二年（1404），成祖朱棣鉴于直沽愈益凸显的军事、经济地位，遂在“直沽”设卫，并将“直沽”改称“天津”。其名称来源，据《新校天津卫志》记载，明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讨伐齐（泰）、黄（子澄）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朱棣率领大军南下时，曾从直沽渡河，袭取沧州，进而打败惠帝。朱棣登极称帝后，在“直沽”设卫时，便赐名“天津”，意指这里是“天子津渡之地”。从此，“天津卫”一名问世。

[2] “卫”，是明朝的军事建制，为明朝首创，即将国家军队的基层组织分为卫、所两级。一卫约有5600人，称为卫指挥使司，其长官称指挥使，1人，官秩正三品。一卫辖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设千户1人，官秩正五品；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每百户112人，设百户1人，官秩正六品；百户所辖2个总旗、10个小旗，约50人为1总旗，1个总旗领5个小旗，约10人为1小旗。军士皆别立户籍，叫做军户，军户是世袭的，一经签派为兵，就不能随意脱籍。卫、所遍布全国各地，自京师至府县，皆有卫、所。设在各府县的卫、所，均隶属各省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又分隶于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统计，全国卫、所兵数已有120余万。一年之后，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卫、所兵数增加到180万以上。永乐以后，全国卫、所兵数又达到270余万。为了保障军队供给，各地卫、所均实行屯田。卫所军士分为屯田与守城两部分，其比例大体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内地则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屯田者专事耕垦，供应军粮；守城者专务操练，以备防守。遇有战事发生，由兵部奉旨调遣卫所军士，临时点将充任总兵官，发给印信，率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官则上交印信，军士仍回到卫所。实行这种军事建制，达到了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军权始终集于中央，中央听命于皇帝一人掌控的目的。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1406），明政府相继在天津设立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每卫士兵足额5600人，天津三卫士（转下）

天津东临渤海，地处九河下梢^[1]，渔盐资源丰富，河海舟楫通畅，且为漕运枢纽、北京门户。因此，随着明初数万卫所军人及其家属从安徽等地迁徙来津，特别是步入清代以后，直隶、山东、山西等地大量无地、少地农民和灾民的涌入，使天津人口逐渐增多。这些来自外埠的军人、农民、手工业者不仅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能、饮食习惯、生活习俗，而且还将他们的宗教信仰传入天津。其中，既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还有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到了近代，西方基督宗教凭借不平等条约，也大举进入天津，遂使这方土地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因此，直至20世纪中叶，各种宗教信仰仍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

本书研究与阐释的对象，是民间宗教在天津的流传历史。

所谓民间宗教，又称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教门、道门、会道门等，是对那些流传下层社会的各种民间教派的统称，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体制外的宗教信仰。^[2]

在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上，明清时代著名的白莲教、无为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天地门教、义和拳教等教派都从外埠传入天津。进入民国以后，九宫道、道院（世界红卍字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外埠教派也在天津拥有广大信众。其中，一贯道还以天津为指挥与传播中心，向全国大中小城镇乃至穷乡僻壤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在外来民间宗教诸种教派的影响与启迪下，天地三阳会、还源教、伯阳正会、在理教先后于明末清初在天津产生。其中，在理教还以天津为基地，流播华北、东北、西北诸省和江南大部分省份。

从事地域史研究，首先应该在时空概念上，对所研究的对象加以界定。研究与阐述天津民间宗教史同样如此，即本书所研究与阐述的对象，在时间（历史）上，应该从何时起始，到何时为止？在空间（地域）上，应该包括哪些所属州县或区县？

为此，本书对其所研究与阐述的对象，在时空上做出以下界定：时间，以史料记载的

（接上）兵定额16800人。永乐四年（1406），永乐帝令工部尚书黄福在三岔河口西南修筑天津卫城，次年竣工。城高三丈五尺，周长九里多，东西长，南北短，形如算盘，故时人称天津城为“算盘城”。卫城辟有四门，东门曰“镇东”，南门曰“定南”，西门曰“安西”，北门曰“拱北”。天津三卫衙署都设在城内，指挥戍守卫城、监督保护漕运、修建和保卫粮仓，以及屯田和军事训练。

[1] 天津地处海河水系下游，由大大小小支流组成的南运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五大干流，均在天津三岔河口汇入海河，流入渤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往往以“九”为极数，即最大、最多的数。因此，人们便用“九河”表示海河水系，用“下梢”代表天津地理位置。

[2] 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总体评价，请参阅濮文起主编：《新编中国民间宗教辞典·序》，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

始有天津民间宗教活动为上限，以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民间宗教活动为下限；空间，凡是明清时代属于天津管辖的州县和民国时期归属天津的区县，均以时空交叉方式，将这些州县或区县的民间宗教活动囊括其中。

由此看来，本书研究和阐述的对象，在时间上，始自明末无为教在天津境内运河沿岸和蓟州（今蓟州区）盘山一带流传，迄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初期取缔会道门运动；在空间上，包括明代的天津卫，清代的天津州、天津府，民国时期的天津特别市、天津直辖市，新中国成立后的华北人民政府天津直辖市、河北省省会天津市以及 1966 年至今的中央天津直辖市所属州县和区县的民间宗教活动。^[1]

从事地域宗教史、特别是从事地域民间宗教史研究，最大的困难是资料的极度短缺。

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佛教、道教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以及经济上的大量资助，其史料的搜集、整理、保藏，可谓世界无匹；各种版本的佛藏、道藏以及分门别类的佛教、道教丛书、类书，可谓汗牛充栋。与正统的佛教、道教相比，由于民间宗教在封建社会被统治当局视为“教匪”而遭长期查禁，致使大量民间宗教资料湮没无存，即使是官修正史、实录、方志以及官方档案、文人笔记有所记载，那也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炫耀其镇压政绩的赞美之词，或是肆意攻击民间宗教的诋毁之语，且支离破碎，不成系统，这就给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将这项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除运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正史、实录、方志、档案、笔记等史料中，进行钩稽、甄别、整理外，还采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展田野调查，从活跃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民间宗教活动中获取资料。在此基础上，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抱持“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有十分资料，

[1] 清雍正三年（1725），清朝改天津卫为天津州，辖武清、静海、青县三县。雍正九年（1731），升天津州为天津府，下辖六县一州，即天津县、静海县、青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沧州。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国民政府改天津为特别市，是为设市之始；是年七月，直隶改称河北，省会设在天津；十月，河北省会迁北平。民国十九年（1930）六月，改天津为直辖市；十月，河北省会再迁天津，改为省辖市。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河北省会迁保定，天津又改为直辖市。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本投降后，天津仍为直辖市。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后，划为华北人民政府直辖市。1958 年 2 月 11 日，天津改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由保定迁天津；2 月，天津划归河北省；是年，省会迁回天津。1966 年 5 月，河北省省会迁保定，复改天津为中央直辖市至今，现辖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滨海新区（2009 年 11 月建立，包括原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宁河区、蓟州区。

说十分话；没有资料，就不说话”^{〔1〕}的治学思想，将天津民间宗教史分为三个时期，以三章篇幅相继阐述，即第一章明末天津的民间宗教，是为肇始期；第二章清代天津的民间宗教，是为发展期；第三章民国天津的民间宗教，是为繁盛期。其中，清代天津的天地门教、在理教，民国天津的红黄蓝诸支卍字会、一贯道则是本书阐述的重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阐述天津民间宗教时，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即从每个教派产生讲起，顺着每个教派的发展脉络，一直讲下去，如对无为教的阐述，延续到清代；对还源教的阐述，延续到民国时期；对伯阳正会的阐述，延续到清代；对天地门教的阐述，延续到当代；对在理教的阐述，则延续到民国时期。对有些教派活动，则以传入天津为起始，也是“一竿子插到底”，如对弘阳教、西大乘教活动的阐述，均延续到当代。对有些教派活动，亦以传入天津为起始，如对义和拳教的阐述限于清代，对九宫道的阐述则限于民国时期。

显然，我们研究与阐述天津民间宗教史，绝不是“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2〕}，而是为了彰往察来，显微阐幽，^{〔3〕}即通过对天津历史上民间宗教活动的解读与诠释，试图告诉人们：伴随着明中叶以来佛教、道教的日益衰微和民间宗教运动的蓬勃兴起，天津也是民间宗教兴盛地区之一，流传过许多民间宗教教派，它们在信仰主义领域相互推荡，竞相发展，而在社会作用方面，它们与佛教、道教等宗教一样，同样具有两重性，既发挥过积极的社会功能，也产生过消极的社会功能；既对社会发展起过建构作用，也对社会发展起过解构作用；既为人们提供过正值的社会资本，也为人们提供过负值的社会资本。^{〔4〕}其中，多数教派经过岁月的磨砺和社会的不断选择，到20世纪50年代初，已湮没无存，但仍有一些教派生存下来，如天地门教、西大乘教至今还在天津、北京、河北、山东、东北等地区传播，而另有一些教派如在理教、一贯道、道院（世界红卍字会）则自20世纪40年代中叶传入台湾、香港以后，至今还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世界拥有广大信众。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世界形势下，

〔1〕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语。

〔2〕（东汉）班固：《西都赋》；（南朝梁）萧统：《昭明文选》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3〕《周易·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4〕金泽：《全面研究宗教在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宗教》，2012年第3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8页。

应以“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1〕}的理念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陈旧思维藩篱，唯真唯实，实事求是，“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2〕}，准确认识和善巧处理当代中国以及海外华人世界的民间宗教问题，并敢于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1〕 李克强：《李克强总理上午答记者问——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今晚报》2013年3月17日。

〔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目 录

总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天津民间宗教的肇始期：明末 1

第一节 无为教 1

第二节 东大乘教 4

第三节 天地三阳会 6

第四节 还源教 8

一、还源与《还源六部六册》 8

二、弓长与大乘天真圆顿教 11

三、王元明与还宗教 15

第五节 伯阳正会 17

第二章 天津民间宗教的发展期：清代 21

第一节 天地门教 21

一、董计升的宗教生涯 22

二、组织结构 43

三、教义思想 70

四、仪式、修持、戒律、甄考 88

五、经卷、歌词	124
六、信众构成	129
七、官府查禁	130
八、流布地域	136
第二节 在理教	137
一、羊宰、张吾山、尹岩	138
二、经卷	143
三、教义、仪式、修持、戒律	147
四、组织系统	155
五、从查禁到解禁	168
六、公益慈善事业	171
第三节 弘阳教	176
一、韩太湖与《弘阳教五部经》	176
二、弘阳教在天津地区的流传	179
第四节 西大乘教	181
一、归圆与西大乘教	181
二、于成功与普亮塔	183
第五节 未来真教	187
第六节 义和拳教	188
第三章 天津民间宗教的繁盛期：民国	193
第一节 九宫道	193
一、李向善	193
二、组织体系	194
三、教义思想	196
四、在天津的反动活动	199
第二节 红黄蓝诸支卍字会	203
一、红卍字会	203
二、黄卍字会	220
三、蓝卍字会	223

第三节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225
一、马士伟	225
二、从一心堂到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227
第四节 一貫道	230
一、源流	231
二、教义、仪式、修持	243
三、组织制度	248
四、天津：一貫道的指挥与传播中心	249
 主要参考书目	259
结语	261

第一章 天津民间宗教的肇始期：明末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分析，天津民间宗教活动肇始于明朝末年，主要流传无为教、东大乘教、天地三阳会、还源教、伯阳正会五个教派。其中，无为教、东大乘教是从外埠传入的教派，天地三阳会、伯阳正会、还源教则是天津地区产生的教派。

第一节 无为教

无为教，又称罗教、罗祖教、罗道教等。明成化十八年（1482），山东莱州府即墨县人罗清^[1]创立。无为教的诞生，开启了中国民间宗教发展史的新纪元；由罗清口述，其弟子福恩、福报记录整理的《罗祖五部经》^[2]被明中叶以来的民间宗教世界奉为共同

[1] 罗清（1442—1527），又名因或英，亦名梦鸿，法名普仁，法号悟空。因创立无为教，被教内信徒尊为罗祖、罗大士、无为教主、无为居士、无为道人。由他口述、弟子整理的《罗祖五部经》是以佛、道思想，对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进行整理与升华的重要经典，对明末清初民间宗教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罗清受到了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世界的普遍崇拜，被尊为“罗祖”。

[2] 《罗祖五部经》又称《五部六册》，即第一部《苦功悟道卷》，一卷，一册；第二部《叹世无为卷》，一卷，一册；第三部《破邪显正钥匙卷》，上下卷，两册；第四部《正信除疑无修正自在宝卷》，一卷，一册；第五部《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卷，一册。《罗祖五部经》阐扬的是一套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宗教思想体系。它从罗清苦功悟道，明心见性开始；接着痛述世间无穷苦难，感叹人生苦短，不可留恋，盼望早得解脱，快入正道；继之历数各种邪见杂法骗人害人，障道败法，并一一加以批驳；在破除邪见的同时，阐明无为大法、无极正道；最后劝导世人坚定信仰，“顿悟成真”，与无边的虚空合为一体，像泰山那样巍然不动，才能彻底解脱，纵横自在，安享极乐。



罗清画像（选自梁景之著《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

经典，并在所述宗教思想的启迪下，诸如黄天道、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一批教派陆续出现，由此兴起了一场空前的民间宗教运动。

无为教出现以后，便在漕运水手中迅速传播。为此，漕运水手在运河沿岸建立大量庵堂，作为无为教传播中心和老弱病残水手驻足之所。天津是漕运枢纽，通过南运河运载的南方漕粮，到达南运河、子牙河、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后，再通过北运河陆续运抵京城。当时，漕运水手在天津境内运河沿岸的静海独流村、杨村河东里地方塔圈、武清塔园等地建有无为教庵堂，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才被当局发现查办。^[1]由此可见，无为教在天津境内运河沿岸，已流传了二百多年。

罗清生有一子一女，子名佛正，女名佛广。嘉靖六年（1527），罗清去世后，佛正承继教权，佛广则从其居住地密云卫石匣城来到蓟州盘山出家为尼，后在盘山东麓怪子峪建造无为庵一座，自创教派大乘教，“外国归从，传化甚众，亦建浮图，遗宗传度”^[2]，成为罗清之后无为教的重要领袖，在民间宗教传说中，她的地位比其胞兄佛正要高，被后世信众尊为“机留女”。

二百八十多年后的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直隶总督那彦成到蓟州盘山一带巡视搜查，发现当地流传无为教。事后，他向嘉庆帝奏报，盘山东麓怪子峪有无为庵一座，在庵内起获无为居士罗公画像一轴，《通明宝卷》《传灯心印宝卷》《佛说圆觉宝卷》各两本。据该庵尼众性空供称：“师父告之，无为居士罗公即系罗祖。该庵开山始祖法名‘佛广’，系罗祖之女，在盘山出家为尼，故后有孙善人修的庙。师父说这庙是前明修的。”本人师祖法名“来明”，师父法名“自亮”，徒弟法名“圆成”。该庵“前殿供佛家，后殿供罗

[1]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台北）第十三辑，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福建巡抚刘世明折。

[2] 李志鸿：《南传罗祖教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6期。